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利乙種第十六號

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上冊》

瞿海源 主編
章英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乙種第十六號

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上冊)

瞿海源 章英華 主編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臺北 南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乙種第十六號

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上冊)

國內定價：精裝新臺幣：肆 佰 元
平裝新臺幣：叁 佰 伍 拾 元
國外定價：精裝美金：貳 拾 元
平裝美金：拾 柒 元

編 者：瞿 海 源、章 英 華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 刷 者：九合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西園路二段261巷20弄32號三樓
電話：(0 2) 2 3 3 2 - 7 7 2 3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二刷

序 言

如所周知，臺灣地區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有特殊的軌跡；而目前臺灣所面臨的種種‘轉型期’的瓶頸究竟應如何突破亦無前例可循。若從當代有關社會文化變遷之研究與理論而言，我們不難發現，眾多研究側重於西方先進國家如何在現代化上起步，如何高度工業化，以及又如何邁入所謂的後工業時期；另一方面，許多研究則探討，開發中國家為何不能滋生自發性的現代化，在現代化的衝擊下，又發生了何種困擾與問題。但是，對於類似臺灣地區的特殊社會文化變遷情勢，尚少論列，對於試圖突破類似瓶頸的情況亦未見充份的論析。於是，就臺灣社會文化變遷作深入詳盡的研究，當可有助於社會文化變遷在理論上和研究上的缺失。

近年來，臺灣的經濟學者與財經人士，似乎逐漸體會到，臺灣的發展，不是單由經濟層面可以突破。經濟發展在實際上和社會結構、文化傳統、價值體系、政治體制，甚至於法令規章息息相關。此外，年來層出不窮的經濟犯罪、官員貪瀆、大型搶案、竊盜泛濫以及日益嚴重的教育僵化、環境污染、城鄉或區域間之不平衡、社會風氣奢靡敗壞等等，在在都顯示出社會文化變遷上的種種問題與瓶頸。在這些實際問題方面，自然需要國內的社、會科學家從事客觀而切題的研究，以作為改進與突破的憑藉。

有見於此，中央研究所經過審慎討論，乃在七十二年春開始籌劃‘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研討會’。希望能邀集相關之學者，就其往日的深厚研究基礎，因應此次研討會需要，作進一步探索，提出嚴謹的學術研

究論文。

過去，學者們亦多關心臺灣的社會文化變遷而從事研究，但數量尚嫌不足，主題亦多分散。也有不少研究只是根據橫斷面的分析而作縱貫性的推論。本次研討會希望能結合社會科學界的力量而在這方面有實質性的突破。雖然社會文化變遷目前正成為耳熟能詳的用語，但是這次研討會特別強調‘變遷’這個主題。各篇論文被嚴肅地要求以這個主題為重心，避免作靜態或猜測性之分析。至於研究範圍，在學科方面，包含了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精神醫學及歷史學。在實質研究方面則涵蓋了人口變遷、職業及教育結構變遷、都市化、價值及態度變遷、宗教變遷、工業化、心理疾病變遷、犯罪趨勢，以及臺灣開發和發展史等範疇。

這項研討會原先預訂邀請七十餘位學者參與，但由於對此項會議有興趣的學界朋友甚多，最後共邀請了一百多位學者與會。為了使研討會在論文討論時能更深入，更切題，主辦單位在會前五天即將大部份論文限時寄交與會學者。同時在會議時間的安排上也特別加長討論時間，每篇論文至少有七十分鐘，最多的有九十分鐘。這項時間上的安排，在會議當時頗受與會者讚揚，咸認去除了學術會議拜拜式的形式主義色彩。本次研討會的另一重要特色則是樸實無華實事求是，沒有邀請政治人物作秀，會場也沒有特意加以布置。總之，一切都只是為了純學術的論辯而設計。民族所動員了許多人力供妥適的服務，但會議的總花費之少卻讓許多與會人士為驚訝。

研討會上共發表了廿篇論文。另一篇因為主要作者人在國外，文稿未能及時趕至。但會後我們約請一位專家對該文加以評論，提供作者參考，因此仍納入本書中。總共廿一篇論文分成七大部份：光復前社會與文化變遷的分析；人口與生育行為的變遷；工業化與都市化；社會階層的變遷；土著社會的變遷；社會心理的變遷；宗教與犯罪行為的變遷。

僅三篇文章專注於光復前。莊英章與陳運棟先生就新竹北埔姜家

墾闢事業之探討來研析晚清臺灣北部漢人拓墾形態的演變。他們發現開發之初，移民流動性大，同時性比例不平衡，因此不易形成宗族組織。面對艱難的拓墾環境，墾民非通力合作難以生存，於是乃透過血緣、地緣關係及共利之原則，組成了各種團體以適應新的移墾環境。當移墾社會的土著化漸明顯，移民子孫繁衍漸增，宗族組織才得成形成。北埔‘姜義豐嘗’的宗族組織就發揮了縉紳之家的血食嘗組織功能，是否不斷利用各種神明嘗會作為整合人羣，控制社會的一種工具。

在分析臺灣早期移墾社會之特性時，蔡淵潔先生在論文中指出：臺灣各地的開發，可以說是閩粵移民以其固有文化適應新開發環境的歷程。清代臺灣的移墾社會承繼閩南粵東重商趨利的傳統，但由於‘移墾’的特殊性，經濟取向更為濃厚。此種取向具體而言乃是市場取向與積極創業的精神以及社會重財之風特盛。對迄今為止的臺灣社會此種取向均有明顯的影響。移民地理流動之頻繁、自然資源不斷地開發，清代臺灣社會上升流動較為活潑，其間又以從事經濟活動為主。在文化方面，清代臺灣的移墾社會大致上文教不興，陋俗盛行，缺少高層次的精緻文化。移墾社會的奢侈、迷信、強悍之風，對於社會發展有所損害。但是，此種小傳統為主的現象，在清廷極力倡導文教下，以大傳統為主的精緻文化逐漸建立。

以上兩篇論文解析了臺灣早期移墾社會的特徵，這些特徵，例如經濟取向與宗族組成的變化很可能與當前臺灣社會的發展趨勢有關。此類研究的學術意義顯然十分重大。

有關日據時代，僅吳文星先生討論了初期的放足斷髮運動。這個運動與中國大陸同時的剪辮與禁纏足風潮相呼應，似為現代化過程的結果，但也是日本殖民政權同化政策之一端。吳先生認為，以當時臺灣的情況言，後者的意義尤大於前者。日本殖民者最初即採漸進原則，歷十餘年後，當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紛紛要求總督府以公權力介入時，才以正

式法令輔之，強化運動的效果。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領導階層大都擔任參事、區街庄長、保正、甲長及教師等職位。吳先生認為，殖民體制下保甲制度的功能較諸傳統保甲大為擴張且更有效。或可謂，日本殖民者在其地方控制體系已經完成時，才配合以強制力。

吳文星先生的文章，關照面雖小，卻是探討日本殖民政策的良好起點。稍後章英華先生的論文提及日據時期臺北市的優勢並未阻滯地區性都市的發展，而以日本人在各類都市人口所占比率的增減認為這與殖民者的統治政策多少有關。黃宣衛先生也論道，殖民者的控制破壞了土著族的社會組織，有助於日後他們對外來宗教的接受。若能配合日人推動的改租政策、皇民化運動，以及其所禁抑的新文學運動等的瞭解，或可為日本殖民形態勾勒出特性，然後進一步討論此特性加諸臺灣的影響。

有關人口變遷的論文共三篇，陳寬政教授因為會議期間人在國外，他與 Winsborough 教授和李美玲小姐合作的論文未能於會中宣讀，但我們仍將之納入本書中。陳教授先與孫得雄先生的兩篇論文為臺灣的人口變遷作了幾乎對立的解釋。陳教授等以數學模型討論臺灣地區的人口轉型。他們把臺灣出生率下跌當作人口轉型的一部份，認為臺灣自一九二〇年開始的死亡率長期下降趨勢改變了臺灣地區整個人口轉型期間的年齡組成，粗出生率隨著年齡組成的變遷而升降。在人口轉型初期，因愈來愈多活存嬰兒的累積降低育齡人口為總人口的比值，壓抑了粗出生率；在人口轉型末期，由於生育水準降低而使幼嬰人口相對減少，如此提高育齡人口的比率而阻滯出生率之繼續下跌。轉型末期生育水準的降低是因為勞動力供給的高潮造成工資率壓力的結果。就此，陳教授等認為出生率下跌只是因應死亡率下跌所造成的年齡組成改變的一種趨勢而已，與所謂的現代化似無必然關係。而家庭計畫的效果不過是加速出生率下跌而已。

孫得雄教授則視臺灣出生下降為現代化過程中，家庭計畫導致有偶生育率下降的結果。他就臺灣地區生育態度與行為的變遷提出了以下的論點。由於社會經濟變遷，家庭型態趨向核心家庭、結婚年齡提高、青年人口有偶率降低、有效生育期間縮短。這些因素促成了生育率的下降，但因死亡率及喪偶率降低而稍趨緩和。

在現代化過程的影響下，子女在父母心目中的價值減低，因而理想子女數已降到三個。但因晚婚及參與勞動，大多數婦女希望早日完成生育的義務，生育間隔因而縮短。同時，傳宗接代及養老觀念仍重，偏好生子而超額生育，又影響了生育率的降低。

一九六〇年代，都市居民及知識水準較高者節育率較高，後來由於教育程度提升，家庭計畫的推行又特別注重農村及低教育程度者，社會階層及地區別的避孕狀況之差距逐漸消失。不過，墮胎卻也有日增的趨勢。由於避孕與墮胎盛行，生育率進一步的降低乃有賴於理想子女數的下降。此外，目前已顯現未婚婦女生育率偏高，年輕人口在性及生育方面持較開放的態度是將來社會發展的隱憂。

死亡率的變化會引起年齡結構的改變，繼而影響出生率的變化，大概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可是出生率的變化是否完全由死亡率的變化所左右？家庭計畫是否只以配角加速出生率的變化？有待讀者仔細考量兩篇論文後再下結論。再者，轉型末期生育水準下降是否純係勞動市場的反映，也難定論。有待更直接的資料以及不同社會的比較而加以驗證。

臺灣地區農業人口顯著下降是很明顯的事實，廖正宏教授在‘臺灣農業人力資源之變遷’一文中指出，就農業人力資源數量上的變化而言，農戶絕對數先增後減，相對數則遞減。其次，專業農戶減少，兼業農戶增加，這是適應社會經濟變遷所發生的自然遷移的結果。一九六四年以後，非農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增加，農村勞力開始大量外移。到了一九

七〇年達到最高峯，而後隨著景氣的變遷而有所變動，唯數量已經減少。

有關農業人力資源在素質方面有幾項重大的變遷：農業人力老化，農業勞力女性化趨勢已經緩和，農業勞力教育程度偏低，農戶人口扶養比逐漸下降。廖正宏教授認為這是選擇性遷移的結果，亦即，青壯及教育程度高者大量外移，女性人口因工業界之需要也大量移出農村。農業勞力雖然不斷外流，但農業人口比例仍偏高。就數量而言，農業勞力之繼續外流應對農業及社會發展有利。但由於農業人口的老化及教育程度偏低卻對農業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可能需要長達三十年的過渡調整如何減低此種負面效果，是必須面對的課題。

本書中缺乏整體討論臺灣工業化的論文，不過鄉村工業化一直被譽為臺灣的發展特色。在本次研討會中，胡台麗博士特別探討了臺灣農村小型工業發展的特質。在論文中，她指出土地改革後，農業收入雖然增加了，但仍屬有限。稍後，農村居民前往新興起的工廠工作，非農業性的收入成為農家資本累積的主要來源。這種資本的累積逐漸又成了農村小型工業發展的基礎。再加上，外銷導向工業的發展，因本地資本家受土地、資本、勞力供應的限制，乃傾向於將工作分包給小型工廠，如此既可壓低工資和避免不景氣時機器閒置和勞工遣散等問題，使得農村小型工業的發展較為有利。

小型工廠在農村的發展也受文化因素的影響。由於沒有大宗族的支配，農村小型工業得以自由、分散、獨立的形式出現。這類小型工廠的設立，據研究，主要是靠父親的資本和兒子的勞力與技術結合。這樣也就促成兒子返家定居。此外，由於姻親通常不住在同一個村落，能夠提供較多的外界訊息，於是姻親關係網絡在小型工業發展時也相當重要，有時也是資本來源之一。因此，所謂‘傳統社會關係’因應不同的社會經濟情境而展現何種經營方式，很值得繼續思考。有關家族企業的研

究也可納入一併探討。

章英華先生討論清末以來不同時期社會經濟與都市體系特質之間的可能關聯。清末時，臺灣在中國的政治地位才告穩定，但長久以來的商業化與對外貿易，使臺灣都市規模雖小，卻有著高於中國本土的都市人口比率，然而大都市間的等級關係極不明顯。殆日人據臺，帶來大量的城居殖民者，在逐步擴展對全島的政治控制時，也促進了農業發展與農產品商品化，都體系的特徵為第一大都市地位趨於優越，地區性大都市亦持缺發展，不過彼此等級關係仍不明顯，小型鄉村都市也陸續興起，只是累積速度有限。光復初期，大量大陸移民形補離去都市的日本人，維持著與日據末類似的都市體系特徵。自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工業化推展，都市分佈近似大小等級關係，中、小型都市成為都市人口累積的主要力量，不過以大都市邊緣者發展最快速，形成幾個明顯的都會區。不論如何變化，地區主要都市的空間分佈大致類似清末的雛形。臺灣的都市發展一直未呈典型的首要模式，固然可從整體的社經特質對此而有某種瞭解，不過若能就不同時期移民的特質，吸引移民的力量以及地區性經濟發展的關係進一步探討，將更有助於我們檢視開發中國家都市發展的首要模式。

蔡宏進教授‘臺灣的社區變遷’一文，雖侷限在‘社區’的討論，但他所謂的‘社區’包括了鄉鎮、都市、或都會，可以說是本書中唯一企圖較整體地探討臺灣社會變遷的論文。但該文相當程度是以工業化以及人口成長與分佈作為解釋變遷的因素，故置於工業化與都市化一篇中。蔡教授以結構失衡與功能減失的觀點說明臺灣最近所顯現的一些社區問題。他先說明社區變遷的外在因素（如工業發展、環境、人口與人性）以及內在因素（如內在自發的緊張因素及計畫性的變遷），再列舉這些變遷所引發的問題：包括人口、空間關係、交通、生計方式、價值、人羣關係、家庭制度、社會組織、社會階層與教育。惜未能很有秩序地將所

謂變遷的內在與外在因素如何導致各種問題明白交待，也未能在各條目中給予充分的證據。不過較整體地討論臺灣社會變遷的意識是值得繼續嘗試，也希望本次研討會的成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在社會階層化變遷的研究方面，本次研討會有二篇論文。首先，蔡淑鈴博士有關職業地位結構的研究指出，臺灣地區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比例並無戲劇性的變化，但一九六八年以後，女性就業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到一九七四年以後則漸趨緩和。在就業的年齡分佈上，男性以二五～二九歲的比例最高，女性在五五年及六〇年時以一五～一九歲的比例最多，到六五和七〇年，則以二〇～二四歲之比例最高。近年來，男女性一五～一九歲就業者就顯著減少。

農林漁牧等職業人口的逐年萎縮與工業生產職業的連續成長是臺灣地區職業結構變遷最主要的特徵。其次，臺灣地區為私人僱傭的勞動者逐年增加，從一九七八年起，受僱於私人的勞動者已成為多數，但同時擁有僱主身份的從業者也有增高的趨勢。相對的，自營作業者與無酬家屬則在逐年減少。總體而論，行業、職業和從業身份三個面向之間的關聯相當顯著。同時臺灣就業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改變了近三十三年來職業與行業分配的變遷趨勢。

關於教育方面的變遷，王德睦、張維安、與陳宇嘉三位先生根據資料檢討臺灣教育機會分配的均等性指出，不論是父親的教育程度，或是兒子的教育程度，均因時間（年輪、代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即表示，教育結構對教育機會有相當的影響。此外，他們又發現，在早期，父子教育的傳承係數先昇，而隨時間的推移，此項係數有降低的趨勢。據此而論，教育機會愈來愈趨均等。但是，在控制了時間序列性之教育結構影響後，父子兩代的教育傳承仍舊顯著。

本書有兩篇論文是關於臺灣土著社會的研究。石磊教授的論文中探討漢化對阿美族家庭結構的影響。他研究了馬蘭、旭海、大港口和馬

四個地區的阿美族後，論稱家庭結構因受漢化深淺而有所不同。即在居住法則上，漢化較深的旭海以從夫居為主，馬蘭在家庭結構上因漢化而接近漢人的家庭結構，但由於漢化較淺，卻又以從妻居為主。最後漢化最淺的大港口及馬太安在家庭結構上接近阿美族的傳統，也多半從妻居。石先生是以土著族接受漢人宗教的程度作為漢化的指標，而認為全面深入接受漢人宗教以致影響到家庭結構的改變。

在‘奇美村阿美族的宗教變遷’一文中，黃宣衛先生指出在清末水稻耕作被引進奇美村以及日據時期政府勢力逼進之後，部落及年齡階級組織趨於沒落，使得一九三〇年代後期，部落性的祭儀日漸崩潰，而變成以家庭祭儀為主。但是家以上的親屬團體卻也喪失了宗教上的重要性。以致於原先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宗教既無法滿足生活所需，也不能幫助民眾解決社會變遷所形成的新問題，終於日漸崩潰而促成了外來宗教傳入的成功。

日本的神道教因統治權的喪卻而消失，漢人宗教在傳教上的消極等原因終使西方宗教在光復後被村民所接納。宗教信仰自由加上基督教在傳教及發放救濟物資所佔的優勢也是奇美村宗教產生變遷的重要原因。不過，大多數村民比較接受容忍傳統文化的天主教，而較貧窮的家庭才接受反傳統文化的長老教會。在這時發揮影響力的是家庭而不是家庭以上的社會組織。黃先生論文的最大特色是將一個部落社會放在臺灣大社會之上，看看它如何因應大社會的改變而發生宗教變遷。不過他還是承認部落社會尚有其主動性，有待進一步探討。

臺灣社會在過去卅多年中，價值觀念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也有部份價值觀念可能持續未變。究竟變得如何，迄無嚴謹研究予以澄清。本次研討會，在楊國樞教授的推動下，有六篇論文採用了兩個以上的時間點之資料來探討這個問題。楊國樞與黃曬莉以 Morris 的生活方式問卷在一九六四及一九八四探究臺灣大學生的人生觀，一九八四的測驗就

是爲本研討會之論文所規劃的。一九六四的樣本爲七八七位大學生，一九八四則爲九六九位大學生。研究的結果發現：1.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四年，臺灣大學生之人生觀的主要蛻變方向是社會約束與自我控制、行動爲樂與進步是尚之價值減低，及自我縱容與感官享樂之價值的增加。此等價值變遷應爲現代化的社會變遷所造成。2.個人現代性與人生觀的關係與社會變遷與人生觀的關係之間具有相當的對應性，顯示根據前者（橫斷面關係）推論後者（縱貫性關係）的有效性。3.人生觀的性別差異較多，院別差異很小，省籍差異則未發現。不同省籍的大學生在人生觀方面的高度同質性，對未來臺灣社會的整合與發展是一重要的有利因素。

採用類似的策略，雷霆與楊國樞利用 Allport 等人的價值研究量表在一九六四與一九八四施測來分析價值變遷的趨勢。結果發現，經濟、理論、與宗教價值有顯著減弱的趨勢，而審美、政治價值則顯著地提升。只有社會價值未變。其次，性別的顯著差異在一九六四與一九八四都相彷彿，即男性在理論、經濟與政治價值上比女性強，反之，在審美、社會、與宗教價值上女強於男。如以各價值強弱的等第而定，則又發現大學生的價值亦有相當的穩定性。亦即，縱使各類價值有不同的減弱或增強的趨勢，彼此的相對強度卻是很穩定的。省籍與個人現代性大致對價值的變遷沒有影響，其間現代性只對經濟價值有正面的關係。院別對價值的影響相當顯著，即除了宗教價值外，理工科的在理論、經濟和政治價值上較強，而在審美、社會價值上較弱。

李本華教授在研討會裏提出有關大學生刻板印象的變遷，印象的主要對象是他族或他國人民。在論文中、他們指出，雖然種族刻板印象有持久性，不易改變，但自一九六二至一九八〇年間，年輕的一代在種族印象判斷時，較前代大學生更能冷靜思考，較少受他人偏見的影響。在他們探討的十個國家種族中，只有美國和日本例外。在對其他各國的

刻板印象中，好和壞的評價都普遍減少，唯獨對美、日兩國，不但壞的評價增加，好的評價驟減幅度更較對其他國家者大得多。這種現象顯然與兩國的外交關係有關。整體而言，在十八年間，臺大學生對德國人的整體印象最好，一直高居第一位；對印度人的印象最差一直為最末位。對中國人的印象，由於我族中心主義的影響一直都很好。對美、英整體印象偏好，對日人則較差，對阿拉伯人略好，而對黑人漸趨不佳。

大學生對其他民族或國家的刻板印象由於漸趨開放而降低了偏見的成分，前述楊國樞等人的研究也發現大學生在人生觀方面有明顯的變化。至於大學生適應生活的方式有無變化當可從心理健康的狀況來加以探討。余德慧及張文雄教授就利用了某大學一九七三至一九八四年的柯氏性格量表來加以分析。在該論文中，他們從心理困擾流行率的趨勢分析發現，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嚴重’與‘中度’心理困擾的比率降低，‘輕度’心理困擾則保持不變。就社會文化的影響而言，某大學新生的心理健康趨勢因性別而異：男性新生在疑心、退縮、強迫性格上有顯著下降的良性傾向；自我強度、獨立性格降低，慮病、焦慮、悲觀、敵意則顯著地在近年來上升，呈現不適應的趨勢。女性新生的情緒失調傾向則降低，自我強度與獨立性升高，顯示女性新生的心理健康逐漸增進。大學生受大學經驗的影響較顯著的為個人成熟，個性的發展，情緒反應則依特定情境而定。

大學生的心理種康有這樣的變遷趨勢，一般民眾的狀況因缺乏資料而不易加以分析，所幸，我們若從精神疾病的病歷資料加以探究尚可勾勒出大概的趨勢。在本次研討會中，林憲醫師就根據臺大醫院自一九五四至一九七四，二十一年間，五萬九千餘份病歷資料從事分析。結果發現一九五〇年代時因受到迅速遷徙、社會動盪所加諸於個體的心理壓力的影響，當時的病患不分男女性別，都以精神官能症的發生最為明顯，又以外省籍男性之出現率為最高。之後，社會漸趨穩定，病患乃傾

向於以身體化症狀來代替戲劇性之焦慮、憂鬱與歇斯底里等症狀為主。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四年間，尤其是女性患者，增加了許多精神生理反應。妄想性精神病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出現率較高。就省籍而言，五〇年代外省人居多數，七〇年起本省人增加而超過外省人。就年齡而言，精神官能症及精神分裂症等功能性精神疾患之年齡有下降傾向。

在心理變遷方面最後一篇論文是朱瑞玲教授的‘父母教養方式之變遷’。在這一項研究中，朱教授對間隔十年的兩批測驗調查資料加以比較分析。結果發現，國中生心目中父母的教養方式有了如下的變遷：近年來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方式是關愛行為增多，而嚴厲打罵行為減少，父母的策教方式以合理的愛護居多，保護、溺愛居次、拒絕與忽視較少。在獎懲運用的頻率上，依序為精神獎勵、物質獎勵、精神懲罰、物質懲罰。整體而言，民主的管教方式已逐漸取代了權威的管教方式。

將宗教與犯罪同置最後一篇中，似甚突兀。但是從二者解釋的觀點視之，卻有相通之處。瞿海源先生與姚麗香小姐強調世俗化宗教的特殊發展，赤裸地說，就是宗教信仰中所含功利性的擴張。而莊耀嘉先生則指陳都市社會中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市場性格等與犯罪現象的關係。瞿海源與姚麗香在探究臺灣三十多年來的宗教變遷後，指出一九六〇年中期之前西方宗教成長快速，而後，則除了獨立教會外西方宗教成長停滯或衰落。民間信仰則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少有成長，七〇年以後漸趨興盛。論文中並探討一九六〇及一九八〇兩個年代社經人口及其變遷因素對各類宗教變遷的關係。結果發現，基督教主流教會及天主教之發展較受社經人口因素影響，而民間信仰、佛教、及基督教獨立教會少受此等因素影響。作者以宗教本身的世俗化和普遍化的程度來予以解釋。亦即在全社會世俗化的趨勢下，最世俗化而又十分普遍的宗教（民間信仰）及最不世俗化而又不十分普遍的宗教（真耶穌教會及佛教）較不受社會變遷的影響下，而中等世俗化程度卻又較不普遍的宗教（基督教主

流教會及天主教)則受社會變遷的影響較大。

在犯罪行為變遷方面,莊耀嘉先生在論文中指出除票據犯以外,臺灣地區的犯罪率普遍下降,但這並不意味著治安狀況漸趨良好,而是顯示犯罪形態的改變。犯罪形態的轉變主要受到經濟發展、都市化及各地特殊人文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隨著都市化、工業化而來的是,強盜搶奪、妨害自由、妨害風化、故意殺人等犯罪行為之穩定增加,而財產犯罪雖然明顯下降,但仍屬偏高。經濟成長對傳統性的財產犯罪有抑制作用,但對暴力犯罪及智慧型犯罪卻少有遏阻效益。都市社會結構及生活方式對犯罪形態有明顯的影響,臺北市、臺中市以經濟犯罪居多,高雄市、臺南市則以逞勇鬪狠的故意殺人為多。花蓮市則以觀光後遺症的風化,傷害頻率較高在論文中。

作者將工業發展分為工業發軔期,成長期及轉型期而深入探究犯罪形態的差異。並就既有之資料及分析提出犯罪趨勢之預測及防制犯罪的建議。莊先生論文最特出之處即在於指出地區性社會文化與不同犯罪類型之間的關係,可惜對各地區社會文化特性只簡略說明,缺乏強有力的證據。但是這提供我們一條線索,思考地區分化的問題。

這項研討會的召開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強調研析含有真正時間因素在內的社會變遷問題。檢視所提出討論的二十篇論文,大都能切合這項要求。在所採用的資料方面,除了極少數幾篇外,都能有不同時間的資料做為分析的基礎。就論文涵蓋範圍而言,所涉及的課題甚廣,但仍有部份重要變遷現象未有論及,如家庭結構變遷,鄉土文化和精緻文化的轉變,以及政治的變遷等。由於是首次嘗試,同時涉及的學科相當多,本次會議,在理論上並沒有的一致性,彼此關聯亦不十分明顯。不過,理論上的多樣性不見得就是一個不好的現象,如果學者們在理論上有所爭執可能更容易凸出變遷的特殊性。

若以廿一篇論文所採用資料的性質來分類,大致可以有以下六類:

一、採用連續性時間序列成三個以上時間點之資料作為分析的依據。其間例如廖正宏教授利用歷年農業人口資料探討農業人力資源的變遷。莊耀嘉先生在犯罪方面的分析則涵蓋了連續三十年的各種犯罪統計。蔡淑鈴教授的職業結構變遷分析採用了三十一年之連續性統計資料。林憲醫師的分析則也用了臺大醫院二十一年的病歷資料。孫得雄教授在分析生育態度與行為時利用了家庭計畫研究所六次生育力的調查資料。瞿海源與姚麗香利用了一部份連續性的官方宗教統計資料，另外又選用了兩批間隔二十年之宗教調查及社經人口資料。陳寬政先生使用歷年臺灣人口統計報表。章英華先生採用日據與光復後多次的普查資料。

二、採用間距十年以上的兩批資料以進行分析。這一部份主要多是心理變遷方面的研究。當本研討會開始籌備時，民族所研究員楊國樞教授積極策劃推動這種性質的研究。因為約在十五至二十年前，楊教授等學者曾經從事過許多有關人生觀、價值觀、刻板印象、教養方式等方面之研究，研究者乃可於今年再行以相同之心理測量工具進行再一次的研究。兩相比較而凸出顯變遷的趨勢及內涵。這一類研究包括了楊國樞、黃曬莉、雷霆、李本華、余德慧、張文雄及朱瑞玲等人的五篇論文。

三、利用史料從事分析，並無十分明顯之時間序列。這類論文一方面因為追溯某一時期之社會文化態勢而利於對社會變遷之瞭解，另一方面作者也試圖強調變遷。其間蔡淵黎對清代臺灣移墾社會特徵的分析雖引起一些爭論，但甚有意義，不過變遷的主題並不十分明顯。莊英章、陳運棟對北埔姜家的分析較考慮到不同時期資料的運用，點出了變遷的若干特性。吳文星的論文討論了一項社會運動——放足斷髮，於臺灣社會變遷瞭解有些幫助，但關照範圍小，若能配合後續的其他運動，當有助於我們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認識。